

【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遗产保护 ——以丁村为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阮艳萍,王 雯

(云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随着参与式影像的深入发展和参与式新新媒介的迅速普及,参与式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关联的文化政治实践都在发生着日渐深刻的变化。参与式民主在丁村生活的部落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是这里的主要治理方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关注弱势群体、赋予民间权利、注重全员收益的思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思路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参与式管理,使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通过参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提高自己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效能感。

关键词: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媒介;参与式民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C958;G206.2 **文章编号:**1673-5420(2017)01-0016-09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事项从自在的生存状态进入到各级名录的过程,从外在的现象上来看是一个被发现、被规划、被命名进而被保护的过程,而从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上来说则是一个自在的“他者”、被“自我”发现和利用的“他者”、与“自我”整合的“他者”,以及同时被“他者”自身“他者化”的过程。这个领域,不仅关乎具体文化遗产事项的保护与传承,更“关涉着这个社会的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关涉着这个社会的物品定价、政治确权,因此是一个社会全员卷入的争议领域”,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的问题,最低程度也是这种问题的表现之一。

数字媒介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带来了传播和传承的便捷,也带来了不同的传播理念和文化遗产观念,并因此带来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理念,涵盖了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本文希望沿着这个见微知著的路径,以云南省非遗名录中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丁村为例,描述媒介(特别是数字媒介)在文化遗产观念变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参与式民主对文化遗产观念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6-12-1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阮艳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数字媒体与文化传播。

王 雯,讲师,研究方向:数字媒体与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佤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技术研究与示范”(2013BAJ07B02);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沧源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EIN2014A001)

一、参与式:影像与媒介

参与式影像是一种影像类型,标志着一套具有特定规范的行为过程和工作方法。从19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参与式影像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云南,这种新的影像类型逐渐在“重现的边疆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等场合陆续亮相。通过草根民众的深度参与,参与式影像成为弱势人群发声的工具和媒介,“给人民赋权以塑造他们的命运”,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无法呈现的观点被呈现到社会表层上来,从而有效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1]20}。正如学者韩鸿所描述,在参与式影像中,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当地人往往都是身兼三种角色:拍摄者、表演者(被拍摄者)、观看者。这些以往的弱势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所感知的问题来决定其片子的主题并控制这些主题的呈现方式,而且,由于参与式影像的观众是特定的小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决策者,这种问题的提出、呈现和解决都比较有针对性。因此,“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1]70-84}。2000年至2003年,郭净研究员在云南藏区开展了“社区影视教育”参与式影像制作活动,教会村民尝试用摄像机表达心声,通过影像“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村民在项目学习中动手拍摄自己的生活并制作成VCD,达到由当地人自己开展本土文化教育的目的。诗人扎西尼玛以他的家乡明永冰川的旅游开发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冰川》。在这部片子里,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当地村民、来自话语中心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从事商业化经营的旅行社经理等不同社会角色纷纷出场,表达他们对当地旅游开发的看法^[2]。郭净总结说,项目中理解的民间,不仅包括了乡村的个人,也包括了他们的社区,项目的执行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到民间,交到了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3]。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草根式表述中,即从文化拥有者的内部眼界“去构思、拍摄、剪接的电影,会把一些完全靠语言进行交流,特别是只能靠调查者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而无法观察到或无法分析的深层内容(如编码、认知、价值观等)揭示出来”^{[4]30}。这种理念的推广,促使类似的项目和活动在云南不断出现,“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7年至今)是出于同样或类似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互换的假设;王雯从2005年开始就在师生影像的领域进行着持续的探索,“沧源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以下简称“保护项目”)是这种努力的延伸。

沧源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相对比于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似乎更愿意以生活中本来的、素朴的样态示人。这对外来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丁村是原生态沧源的一张名片。它位于县城西北方向的勐角乡,距离县城34公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丁村独特的自然景观,促成了传统生活习俗和人文风貌的养成,这些都是丁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丁村在2006年云南省开始“非遗”工作之初就进入了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名录,同时是3A级风景名胜区。

对丁村的媒介报道,始于21世纪初。《中国国家地理》中一篇《远去的佤山》,以奇异的服饰、自然的风景,把这片未经曝光的处女地推到了读者的眼前。在发展旅游改善民生的现实语境中,这是不同凡响的一笔。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丁村吸引了一批摄影爱好者、纪录片故事片创作者和各路

文艺中青年。电影《孔雀眼》、电视剧《云南往事》在丁村的拍摄并播出,又陆续掀起了小小的涟漪。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丁村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摄影、旅游论坛。作为一个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丁村开始拥有自己独特的粉丝群体。2011年,亚洲艺术节的微电影节在临沧开幕,丁村成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电影委员会挂牌的拍摄基地。《情定司岗里》《不灭的火塘》等一批微电影在丁村盛大开机,轰轰烈烈地开启了丁村的新媒介时代。移动互联网络更是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个奇异的丁村空间:原始部落、寨主、佤族、烟斗、大耳环、黑齿……这不仅带来了影视创作中内容场景的拓展和丰富,为观众提供了美妙的视觉感受,也为丁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提供了新的时代语境和话语空间。参与式影像在这里也得到了多种样态的发展。

丁村的参与式影像有多种参与层次,按照文化持有者参与的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有这样一些形式:完全自主的影像多由在外上学的孩子们用智能手机拍摄并推送到微信、微博等平台;外来背包客们在“大众点评”等移动应用中的影像则往往有丁村人的意见参与和具体修改要求;本课题组在“保护项目”中的作品则在不同阶段把素材和编辑的阶段性作品播放给相关文化主体观看,在双方的不断交流中完成后续工作。这种做法其实由来已久,“纪录电影之父”弗拉哈迪、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都有过类似的努力,他们的探索给我们的项目开展提供了很多启发。鲁什曾回顾这种做法,说在拍摄结束几年之后,他回到了萨克渔民中间,把之前拍摄的片子放映给他们看,当地人这才明白“为何我成天手里拿着这么个古怪玩意”,在影片中,他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也发现了电影语言与传统之间的通约性,他们一遍接一遍地看片子,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提出批评,指出片中的失误。这种瞬间“是一种分享人类学的开端,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了一种关系。我把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写的一本关于他们文化的书送给他们,他们拿来却毫无用处。可我只用一个屏幕、一台放映机、一台发电机回顾某一个民族时,就真正地走入了他们中间”^{[5]202-220}。无需通过他们原本就不适应的文字,数字影像技术使用的直观的视觉语言和亲切的口头语言可以方便地直达文化持有者的内心,而且视听兼备的传播更接近他们的口承传统,于是沟通的方式与效果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分享人类学越来越成为可能。而看完样片的当地人不仅立即把感想告诉他,那些熟悉当地传统的古老仪式和生活习惯的长者们,“不仅帮助弗拉哈迪再现往昔,还帮助他检查片中是否有错误”^{[6]121}。在传统民族文化的媒介生产中,这种做法大大加强了当地民众的话语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话语权,当地民众从被调查对象变成了传统民族文化媒介表述中的主动参与者与评判者,也因此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分享者和主动参与者。

丁村的媒介生产中,从传统时代到今天的数字生产时代都有丁村人的参与,他们有时是电影的群众演员,有时是纪录片的主角,今天他们也不例外地成为微信朋友圈的推送人。在这些不同的媒介生产方式中,他们的参与程度也是有所区别的。电影、微电影是虚构叙事,可以“自说自话”不用照顾丁村人的现实生活状况,群众演员只用听从副导演的指挥即可;纪录片中描述丁村人自己的生活,虽然聚焦的角度、叙述的立场多少是带着创作者的外来眼光,但村民们毫不介意这种经过“折射”和“散射”的描述,有时甚至主动附和这种角度和立场;而“大众点评”和朋友圈的推送则多少沾惹上了消费主义的时代气息,丁村人或是亲自上阵或是配合旅游者,为自己的农

家乐或是客栈贴出新新媒介的广告。在这些不同的参与形式和程度下,丁村人在从“他者”不断走向“自我”,而影像的参与正是生活参与的另一种显现方式。丁村在当代社会中因此具有了多方面的存在意义,不仅于丁村人,更是于各类观察研究者、媒介生产者。丁村从传统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的华丽转身,正与“保护项目”中成员的不断成长、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一起昭示着社会文化媒介生产的日渐丰富。

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参与式的媒介生产成为可能。新新媒介的加入,是新新人类进入传统民族文化传播的技术前提。所谓新新媒介,是相对旧媒介、新媒介而言的。在莱文森眼里,出现在互联网之前的一切媒介都是旧媒介,它们有着不变的空间和时间定位,方便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和专业的媒介生产,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均属此类;而互联网上较早出现的媒介应用则被莱文森称为新媒介,它们可以依照用户方便的而不是业已确定的时间去被使用,比如聊天室、留言板、电子邮件;而新新媒介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如博客、维基、脸书、推特等,其特征和原理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消费者即生产者,生产者多为非专业人士,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一般免费,新新媒介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7]3-4}。就是说,新新媒介是一种可以充分满足参与者需求的媒介平台,任何人都可以任何形式和水平参与任何内容的媒介生产和消费。

新新媒介的迅猛发展,也把丁村的日常生活卷入到这场媒介风暴之中。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搞清楚,村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世界发生了不同往常的变化。世界不再由“上面”牢牢掌控,也不再是只听老人们一声令下,而是逐渐变得微妙多义——和电视台“编导”们的友善关系,或是和外来“调查者”的交流互动,都会带来不同的生活便利,有时甚至会影响孩子们人生的重大抉择。这些便利,更多地是由“大众点评”或是旅游攻略的网上推送带来的,专业的“编导”、不专业的游客、甚至是自家的孩子,谁都可以随手把广告免费推送给下一批外来客,而消费者又成为新的生产者,为消费品赋予、生产出新的特性和内容。这种生产既关乎物质的具体层面,如生态食品的鲜美、客栈设施的闲适,也关乎精神的抽象层面,如叫魂仪式的动人心魄。这种新新媒介的生产,让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丁村,正如莱文森本人所描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最能从新新媒介的问世中受益。这是因为新新媒介的首要特征是使消费者成为生产者,换言之,新新媒介使每个人能创造媒介的内容,而且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内容”^{[7]1}。

二、参与式:政治与民主

从1960年代开始,阿诺德考夫曼、麦克弗森等学者在参与式民主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正如媒介环境学学者所言,“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8]69}。当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民参与条件的成熟,这使参与式民主以新的形式在西方实践领域重新活跃起来,远程民主、协商民主等都被看作是参与式民主的新发

展,扩大了公民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组织中的直接参与,普通公民逐步参与到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决策过程中。

参与式民主在丁村生活的部落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参与式民主是这里主要的治理方式。在从前丁村“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中,村寨的公共事务,无论是叫公共的谷魂,或是共度狂欢的节日,老人们都是这里的决策参与者。寨主是这种老人政治的核心。在他的张罗下,各有长处的老人们根据鸡卦算出吉日吉时,对活动的具体流程和安排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大多数人同意、取得一致的行动决议的情况下才会举行重大活动。这种参与式民主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程度。据寨主儿子YJG的回忆,历史上确有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取消了的叫魂活动,但他也记不清发生在哪一年了。应该说,这里的不同意见更多是针对活动进行的不可行性论证,因而别人会认真思考这些不同意见,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起到作用,最后往往不需要用我们常见的民主集中的方式再进行决议,而是老人们认真审议、综合不同意见之后集体决策得出一致的结论。这种一致,与其说是少数意见与多数意见的抗衡,不如说是通过合作获得(或是接近)“真理”的过程。所谓民主的真谛,应该是持不同意见者始终得以参与协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丁村在传统时代的治理是完全的参与式民主治理:从寨主的选择,到各种职务义务与权力的赋予,每个人都有流动的机会、充满着为实现这种流动而努力的希望和动机。

后来随着社会的逐渐变迁,这种治理方式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寨主变成了世袭的,退休的支书加入到老人政治集团中,甚至连主持祭祀的“毕哉”也变成了汉人学者从拉祜族那里借来的“摩巴”^①,而拉木鼓^②这样的重大宗教活动也几经变化成为了旅游项目之一。新媒介特别是新媒介时代到来之后,“参与”的方式与内容发生了诸多的新鲜变化,吸引了研究者的眼球。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之间的关系。从前村子里的事情老人说了算,家里的事情大人说了算,孩子们只需准备好一颗听从、学习的心就好。可是智能手机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开始成年人接受起来总有诸种障碍,而孩子们和这玩意儿似乎具有天生的亲密——这种情况城乡皆然,丁村也不例外。外出学习的孩子们,有的有自己的手机,有的趁回家时用用父母的。但不管哪种情况,父母的微信由孩子开通或是负责“打理”改变了孩子的话语权,也让父母与他们的对话多少有了些商量的口吻。YJG的微信也由儿子WJ掌管,WJ在朋友圈一会儿发小伙伴们喝啤酒一会儿发村里的生态书屋开张,笔者心里会明白这是帮爸爸发的,那是他自己的。后来WJ索性重新给自己申请了另一个微信号。

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从外而内地改变着人们具体而微的生活,人们之间亘古延续而不断变化的关系也在媒介的介入下变得微妙起来。手机成为媒介达人们进入权力社会、参与政治秩序的一种武器。新媒介不仅带来了不同的言说方式和内容,也带来了不同的传播和传承方式,以及不同的观念和思考。

^① “摩巴”是拉祜族对主持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巫师的称呼,其实他们往往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行政长官。佤族则称这类人为“毕哉”。学者们把拉祜族的这一称呼移植到佤族的描述中时,文化持有者们没有表示反对。他们的态度很达观,认为只要沟通成功就可以了。

^② 木鼓是佤人敬重的通天神器,一般不敢轻易对待。据研究者梅英访谈记载,佤族地区最早参加拉木鼓拍摄的村民最后疯癫而死。

三、参与式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这一原则在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战成果。但就目前而言，自上而下的管理是主导，甚至在很多地方是唯一的路线。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关注弱势群体、赋予民间权利、注重全员收益的思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思路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参与式管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通过参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包括组织发展和个人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效能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关涉多方利益。以丁村为例，这是一个沉睡数百年而一朝发现自身价值的省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丁村建寨已有 500 余年，寨民主要有杨、肖、田、李四个姓氏，他们的先民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由于地处偏远，丁村不仅形成而且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佤族文化传统，其遗产类别涉及的门类多、样式全，从农耕兼狩猎生活方式到纺织、竹编、原始宗教、歌舞、民俗和系列节庆等，较好地保留了原始生活的方式和观念，同时也在现代化语境中引发了来自各方的思考和对话，在纸媒、电影、各级电视台的各类或虚构或纪实的节目中，以及各种网络旅游攻略中频繁露面。这一系列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不仅关乎丁村人的日常生活和收入，关乎文化遗产地社区的建设，更关乎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餐饮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关乎当地宣传部门、发改委、旅游局等党政工作，也关乎以之为资源的学校、机构和课题组、研究者，甚至文化旅游中的游客。处理好多重语境中的多重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现实中多方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寻找到恰当的利益契合点，从而使多方共同受益是关键。在以往的工作中，从政府或是精英的视角出发往往是常规的思路，“某领导”或是“某精英”的意见也许可以将一个村寨带上致富的道路，但关注弱势群体、赋予民间权利则更有利于实现全员获益。丁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正是基于此促进了全员获益。

丁村是在 2005 年前后申报首批省级非遗时以“原生态佤族文化”的名片而入选的。这一申报要点来自于基层的县委县政府。事实上，丁村和它所属的沧源，与民族风情浓郁而佤族元素夸张的西盟相比，是以原生态和无夸饰为特色。这是丁村当代生存的一个起点，村民们把这个时间起点叫做“发展旅游”。“发展旅游”以来，丁村发生了若干变化，如小学的搬迁、传习所的建立、佤王府甚至景区办公楼的建盖，都是传统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动作。但在这些大的动作之下，丁村发生的变化却是各方主动参与的。

如丁村沿着旅游干道的小摊出售的各种纺织品，麻织的挎包、马甲和更为传统的“统帕”，既展示这个族群的传统，也显露着纺织者的智慧和观察力。据 XOM 回忆，当时她发现客人很喜欢佤族传统的“统帕”之后，就尝试着织出来出售，甚至采用更有特点的麻作为材料，今天这些创新已经被大部分村民接受，也逐步进入到丁村非遗保护的报道之中。在这个过程中，XOM 夫妇以自身的勤劳、聪慧获得致富带头人的身份，成为非遗参与式活动中的领袖级人物，并由此带动了村民的参与式非遗生产。村民们参与的方式还包括在村内开办农家乐，提供食宿服务等；出售亲自手织或是从县城进的各种织物；出售丁村特产；开食品杂货店同时为村民和外来客人服务。

除了个人参与之外,社区参与也是丁村非遗活动及其管理的方式。丁村有数量繁多形式各异的叫魂仪式。以往的叫魂都是在毕哉根据看鸡卦的结果选定日子之后按期进行。但在发展旅游之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有时也会将这个日子与旅发委布置下来的某些任务“两厢结合”一下。老村支书退休加入到村里的老人政治集团之后,他依然联系旅发委,同时又负责看鸡卦的工作,他的权威性得到村中占头把交椅的老毕哉的首肯。应该说,以老人集团为代表的传统社区和以村委会村党支部为代表的当代社区在丁村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共生,他们对丁村非遗进行着有效的社区管理。对社区资源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村委会也负责组织村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歌舞迎宾、大型打跳等活动。全民参与和全民获益是丁村在这类活动组织中的特色,也是丁村人经济收入稳中有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非遗的独特价值,非遗文化旅游成为非遗生存中的一种重要样式。自觉不自觉地,经营者在实际经营中也会逐渐发现非遗的价值,从而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期待去对文化遗产进行参与式保护。YJG 作为寨主的儿子,同时是一间农家乐的经营者,从一开始的心不在焉到后来的全心投入和担当,其中当然有各个方面的原因,比如伴随着年纪渐长而对文化的认知渐长,比如耳濡目染,甚至被外来研究者、拍摄者感召,而不可回避的一点就是作为经营者亲身体验到的“文化惠民”——除了客栈的白被单、麻织的长椅垫和干净的淋浴房之外,寨主家的特殊地位也是这家后来居上的“寨主家客栈”的重要“卖点”之一。

其实参与到非遗生产中的还有很多个体、群体和机构:县委宣传部的 ZSF 出于工作需要而不断接近丁村和丁村文化,而丁村也在她的报道和各种汇报中不断定型又不断变型,在传统社会与当代价值之间达成各种对话和整合;人类学研究者更是这里的常客,以我们遇过的编导 LCY 为代表,他已经在丁村出入多年,拍过丁村几乎所有的仪式活动,认识丁村的所有男女老少,甚至出主意建起了 YJG 家的客栈……丁村的今天,非遗的明天与他们息息相关;游客们不仅在非遗旅游中得到精神层面的收益,也有物质经济方面的利益维护,他们在大众点评或是蚂蜂窝上的一段话也许就是一桩生意、一段缘分。

这种思路在英、美、日和其他地区有很多典型的成功案例。比如日本在市民倡导下的保护妻笼运动;比如台北民间自筹全资修复大龙峒保安宫的案例在 2003 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民间保存奖项^[9];又比如巴西的一座博物馆“充分考虑社会个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关于文化遗产的构成及其呈现方式的决策权”,吸引和鼓励公众为文化遗产创造意义,从而促进社区的文化发展^[10]。各种 NGO 组织更是把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得专业、独到、形式多样。这既与丁村的今天不谋而合,也为它的明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参照 Sherry Arnstein 的“市民参与的阶梯”理论^[11],丁村文化遗产保护中村民和其他组织人员参与的程度从高到低有六个不同层面:完全自主的新媒介生产,媒介生产者与村民共同协商,村民投入发表意见,不发表意见地投入配合,村民单方面听从,管理部门完全支配的政府行为。而且,在多种因素,如政府行为、媒介生产等的共同作用下,丁村人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有所提升。

在这个多层面共存的局势中,丁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管理经历了遗产观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个发展历程。丁村几百年发展中保留下来的非遗传统,在当代依然生动具体地存在于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伐薪燃炊、男耕女织。正是如此,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每个丁村人的思虑中,毕竟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生活方式与质量、儿女读书与未来,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抉择与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的背景,亦是生活的资源。丁村这个地方、这个人群的自我定位,通过经营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发生着默默的改变。其实,扩而视之,整个中国社会亦在总体上以及各个方面通过文化重新寻找自己、呈现自己——纠结着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既是文化遗产的当代保护,也是文化政治的当下实践。参与式遗产保护的实践,正是参与式政治、参与式民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种具体化,因而也正是这个领域中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实践路径之一。

四、丁村参与式观察的实践反思

参与式观察是经典的民族志田野工作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直接参加到所观察的对象的群体和活动中去,在参与活动中进行长时间、设身处地的观察和研究。这种方法要求参与者像被研究者一样行事和理解事物,所选择的地点要便于研究者进行观察,这会加大获得客观的观察结果的难度。至于研究者真正的身份,按照民族志研究理论,是应该在讲究技巧的前提下向被研究者公开的。

本研究的开始和开展,都与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沧源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同步,事实上,两位作者中的王雯正是该课题的负责人,而阮艳萍也作为成员参与了该课题从项目策划、作品选题、拍摄策划及具体的拍摄事务,本课题理论研究的总体思路从一开始就与实践课题处于“共谋”的关系之中。可以说,这是参与式观察作为一种经典的民族志方法在乡村田野之外的尝试。课题组就是笔者参与观察的田野点之一。

由于项目组成员的身份之便,笔者既是“保护项目”的参与者,又是本研究的“观察者”,在参与中观察、在观察中参与,这带来了研究上的便利,可以时时地交叉进入乡村的田野和课题组的“田野”,对传统民族文化媒介生产和当代传承进行更为完整的、至少是两种视角的灵活切换。通过观察和交谈在不同的文化持有者之间、数字化实践主体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达成对话,描述和解释传统民族文化数字媒介生产的现象和过程,近距离地研究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和保护。这样的情形大大减少了以往工作中项目负责人力避成为研究的“小白鼠”而口头答应,实际上设法拒绝参与观察者入场的研究困难。

当然,这种参与式观察的新尝试也带来了困境:由于参与式观察者过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贴近被研究对象,这会使被观察者感到紧张从而表现出异于内在的外在表现;“保护项目”的课题组成员、项目执行内容对笔者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成员和环境,这使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变得和谐的同时,也让研究者容易对一些问题视而不见,失去观察的能力和敏感性,甚至被同化。观察结果与经典的“客观真实”的民族志标准之间容易产生距离。

对于第一种情形,“脱敏、脱敏,还是脱敏”,当课题组成员知道也逐渐适应参与式观察就是项目中的一个部分时,为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就顾不上紧张或特意“表现”了;但对于第二种情形

(这有一点像本土人类学研究),研究者在研究体会加深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敏感状态。至于做到与否,做到多大程度,只能是靠后来评说了——既靠后来的学者,也靠自己的不断回顾、反思,以及新的实践。

这里,远远不是终点。

参考文献:

- [1] WHITE S A. Participatory video; images that transform and empower[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2003.
- [2] Azara(郭净). 卡瓦格博外转朝圣笔记之二[EB/OL].[2016-07-16].<http://azara.tibetcu.com/378.html>.
- [3] Azara(郭净). 影像的声音[EB/OL].[2016-07-16].<http://azara.tibetcu.com/1419.html>.
- [4]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 民族志电影史[M]//保罗·霍金斯. 影视人类学原理. 王筑生,杨慧,蔡家麒,等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5] 让·鲁什. 我们的图腾先祖与疯狂的灵媒[M]//保罗·霍金斯. 影视人类学原理. 王筑生,杨慧,蔡家麒,等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6] 邓卫荣,刘静. 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7] 保罗·莱文森. 新新媒介[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8] POSTMAN N. Science and the story that we need[J]. First Things,1997(1):69.
- [9] 蔡文祺.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步入公众参与时代——专访台湾文化遗产法专家谢银玲博士[J]. 东方收藏,2011(9):10-11.
- [10] 维维安·帕内里·萨拉夫,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奥利维拉·布鲁诺. 文化遗产,参与与开放[J]. 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5(1/2):83-93.
- [11] ARNSTEIN S.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69(4):216-224.

(责任编辑:刘云)

Participatory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new media era: media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Dingcun Village

RUAN Yanping, WANG We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video and the popularity of participatory new media, participatory culture has become a general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n this contex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associated political practices are changing more profoundly every da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very obvious in Dingcun tribal life era, is its major governance. With mo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 being done, concerns are put more on such ideas as caring for vulnerable groups, civil rights and benefits for all. One approach to realize these ideas is to develop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aking all stakeholders achieve self-develop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their sense of efficiency in politics, culture and economy.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video; participatory media;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ew media